

## 書 評\*\*

張 寧\*

Alexander Des Forges

*Mediasphere Shanghai: 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*

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'i Press, 2007, 278 pages. ISBN: 978-0-8248-3081-6

本書是戴沙迪（Alexander Des Forges）教授出版的第一本專書，可謂初試啼聲之作，成果令人驚豔。作者從文學的角度，分析清末以來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。乍看之下，好像是繼王德威《被壓抑的現代性》之後，另一本研究晚清小說的著作，但仔細觀之，便會發現，戴沙迪至少在兩方面，與前人有明顯的不同。首先，他一反過去研究者以文學形式為分類基礎的慣例，改以城市為單位，將所有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，不分流派，盡歸為一類，並稱之為「海上小說」。其次，作者雖從文學著手，其關心點其實相當歷史，藉檢視海上小說整體的敘事技巧，作者希望看出這些小說如何建構上海的城市形象，從而協助上海成為全國首席城市，乃至國際級的大都會。顯然，對作者而言，上海不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，更是晚清以來報章雜誌、小說書籍，乃至電影圖像等文化生產的中心。他要以這個角色來解釋上海的歷史，而這個角色無以名之，戴沙迪遂自創一詞，稱之為Mediasphere。

---

收稿日期：2008年6月26日，通過刊登日期：2008年7月15日。

\*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。

Ning Jennifer Cha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Academia Sinica.

\*\* 本文撰寫期間，蒙巫仁恕、孫慧敏兩位教授閱讀初稿，並提出建議與指正，謹在此致謝。

爲支撐此一Mediasphere的概念，作者不僅把分析的對象擴及各式不同類型的小說，也把觀察的時間跨度拉大。先從晚清小說入手，繼而進入1920、30年代的現代派文學，最後甚至旁及二十世紀末文化人的懷舊遺緒。其中，晚清小說是其出發點，也是論述的主力。這類小說因內容大量涉及長三書寓、么二堂子等風月場所，在文學分類上，往往被稱作「狹邪小說」或「豔情小說」，同時由於其暴露滬上的嫖賭世界，有時甚至被歸於「譴責小說」之類。其中最著名的莫若韓邦慶的《海上花列傳》（1892-1894）、周弢的《海上塵天影》（1894或1896）、李伯元的《海天鴻雪記》（1899），以及孫玉聲的《海上繁華夢》（1898-1906）等。這些小說採章回體的方式在報上連載，與滬上新聞間的關係常有跡可尋，因此普受讀者歡迎。進入民國，它們或被重印，或出版續集，同時類似文體的寫實小說仍持續出現，如朱瘦菊的《歇浦潮》（1916-1921）、包天笑的《上海春秋》（1924）、烏目山人的《海上大觀園》（1924）等，即爲顯例。

過去對這類小說的分析雖多，但多半針對個別的作品單獨地予以檢視。戴沙迪主張，這些小說應該當作一個文類來整體分析，而這個文類，不是什麼狹邪、豔情或譴責，而是《歇浦潮》中所提出的「海上小說」，亦即以上海城市生活爲主題的小說。只有分析這些小說與上海這個城市的關係，才能看出其共同的敘事特色，包括對城市空間鉅細靡遺的描述、情節的快速轉移、故事主副線界線的模糊不清、多線交錯進行的敘事結構，乃至強烈的當下時事感等——這些均與傳統章回小說中的主題清晰、逐步醞釀的手法大相逕庭。戴沙迪認爲，情節的快速轉移，可能係因這些小說最初均在報紙連載，爲吸引讀者，不得不數段一轉折。至於對城市空間鉅細靡遺的描述，可能也與書中人物過多，必須藉確切的空間、地點來作爲定位有關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這些手法正烘托出城市生活中一項接一項令人喘不過氣來的速度，以及都市人無從定錨的失落感。戴沙迪指出，正因爲海上小說對城市空間，乃至當下時事的充分掌握，以致外埠讀者甚至可以把這些小說當作旅遊導覽來閱讀，比如說，到上海應該去哪兒玩（如張園、愚園、跑馬、賽會）？租界上哪些規矩要留意（如不可隨地便溺，不可聚衆喧嘩、禁吃鴉片）？賭博時有什麼詐術要留心（如牌九中有亂筋牌、抓灘中有飛錢、搖灘時慎防賭棍以吸鐵石操縱點數等）？現在最新、最流行的是什麼（如坐馬車夜遊、戴金剛

鑽戒)？上海的城市形象以及在全國民眾心目中的地位，便在這些最新資訊中逐步建立。

戴沙迪既然以城市作為小說的分類單位，在處理完上述章回體的「舊」文學之後，便進一步將觸角擴及五四以後在上海陸續出現的「新」文學，包括茅盾的《子夜》(1933)，以及新感覺派作家如劉呐鷗、施蛰存、穆時英等人的短篇小說。這些作品在文學形式、用語、內容等各方面，均與晚清小說大相逕庭，以致過去的文學研究者很少將兩者相提並論。一般認為，兩者主要的相異處包括：晚清小說著重於對空間的描繪，而1920、30年代「現代派」小說的主要關心點則在時間；此外，早期的上海小說近似街談巷議，可以當作社會新聞閱讀，而新感覺派則著重描述抽象經驗，目的在引起讀者的震驚與深思等。兩者的斷裂性雖然明顯，但是戴沙迪認為：從「海上小說」的角度看來，其延續性仍然有跡可尋，這些包括對城市空間地點的清楚描述（在舊小說裡是租界里弄、張園、愚園；在新小說裡是跑馬廳、電影院、舞廳），對獨立女性的描繪（在舊小說裡是自私跋扈的紅倌人、在新小說裡是大膽熱情的摩登女郎），對外來語言的使用（在舊小說裡是吳語與北京語間的掙扎，在新小說裡是英、法、日語的大量引用），乃至不時被打斷的敘事結構等（在舊小說裡是大量的情節轉折，在新小說裡是片段而破碎的意識流）。

除了將新、舊文學一併納入「海上小說」的分析範圍，作者更進一步觀察此一文類在1949年以後的遺緒。1926年上海亞東圖書館重印《海上花列傳》，胡適與劉半農為之作序，稱之為「吳語文學中第一部傑作」，從而引起張愛玲的留心與鍾情。1970年代末，張愛玲為喚起不懂吳語者對該書的注意，將《海上花列傳》中的吳語對白譯成國語，後來果然引起侯孝賢與朱天文的興趣，將之改寫為劇本，於1998年拍攝成電影《海上花》。電影版的《海上花》因受張愛玲對該書詮釋的影響，在故事節奏、觀察角度等方面均與原著相去甚遠，但從胡適、張愛玲、侯孝賢此一脈絡，可看出歷代文化人一次次發掘過去、保存歷史的懷舊情緒。

在中國傳統學科分類中，文學、史學本為一家，但進入現代之後，在學術精細分工的情況下，文學與歷史在研究方法、使用材料，乃至關心的議題各方面，不可諱言，已漸行漸遠。以小說為例，文學研究者多關心其美學結構、敘事風格、情感表述；而史學研究者則多留心其寫實細節，以使用來佐

證、對照已知的史料，從而還原歷史「事實」。戴沙迪是少數歷史感甚強，能將兩者治於一爐的學者，他不僅獨創一格地將所有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，不分流派，盡歸一類（此舉本身便不太「文學」）；更廣泛引用史學方面的著作，試圖與上海歷史發展的現實進行對話。所以歷史學出身如筆者，閱讀其作品時，並無霧裡看花、虛無飄渺之感，反而常感驚豔與受益。然而，或許正因假借史學成果之故，戴沙迪在面對具爭議性議題時，在觀點的選擇方面，有時多少有待商榷。譬如，書中一開端便討論租界的出現與上海城市興起之間的關係，為打破西人向來「上海的繁榮是西人胼手胝足締造出來」的論述，作者故意反其道而行，採用張琳德（Linda Cooke Johnson）與戴鞍鋼等學者的看法，指稱上海遠在租界建立以前，即已是通商大埠；甚至援引1832年活躍於中國沿海的郭士立（Karl Gutzlaff）與胡夏米（Hamilton Hugh Lindsay）兩人的觀察，稱上海為當時中華帝國的主要商業大城，其貿易量可與倫敦相提並論（頁18與頁192註51）。據筆者瞭解，郭士立為普魯士籍的醫療傳教士，胡夏米則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表，兩人為福音、為商務，均希望當時的英國政府能採取強硬手段，迫使清廷開放通商。1832年，郭士立受怡和洋行之邀，擔任傳譯，隨胡夏米沿岸上行至威海衛，為鴉片探勘市場，回程經過上海、杭州等地，遂留下前述觀察。<sup>1</sup> 這些觀察不僅是個人記述，也是後來英國國會考慮是否發動鴉片戰爭的重要參考資料。郭、胡兩人將當時上海的貿易量，提高到與倫敦等等的地位，與一般常識或歷史認知頗有差距，這可能是觀察有誤；但從另一角度觀之，或許也可能是有心為之，希望藉誇大上海商業的繁榮，來吸引英商與英政府的注意，從而迫使清廷開放通商。史學研究者在引用史料時，通常會考慮其動機與可信度，經取捨後，方予引用，戴沙迪在引述類似材料時，似亦宜斟酌。

同樣從史學的角度來看，在小說本身的傳承方面，戴沙迪很成功地從晚清一直橫跨至二十世紀末，但如果不是往下看，而是往上追溯，便會發現晚清小說與過去的關係未必是一個斷裂。假如以城市為單位來為小說分類，明

---

1 參見 Robert Blake, *Jardine Matheson: Traders of the Far East* (London: Weidenfeld & Nicolson, 1999), pp. 46-48, 79; 中譯本見羅伯·布雷克著，張青譯，《怡和洋行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2001），頁46-49、82。

清其實有不少小說是以市井為背景，最著名者莫如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，此外也有許多所謂的「香豔筆記」是以名妓與風月場所為重心，清末王韜曾將這類作品輯成《艷史叢鈔》一書，其中包括以金陵為背景的《板橋雜記》、《雪鴻小記》、《秦淮畫舫錄》；以蘇州為背景的《吳門畫舫錄》；還有王韜自己所撰，以上海為背景的《海陬冶遊錄》、《花國劇談》等。這些文本雖然在文體、用語、形式等方面，與海上小說頗有差距，但以城市為背景的特色則一。這些作品與作者所謂的「海上小說」關係如何？彼此間有多大的斷裂與延續？這些問題可能均值得進一步探討。

最後，自1980年代起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腳步的日益加速，上海研究漸成風潮，東、西方學者紛紛投入，試圖從各種面向分析這個城市璀璨的過往。<sup>2</sup> 當歷史學者不斷從實證入手，文學研究者則更傾向以單一概念貫穿上海歷史，李歐梵著名的專書《上海摩登》(*Shanghai Modern*)，便以「中國的」現代性為主軸，一語概括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歷史的發展。戴沙迪既以 *Mediasphere Shanghai* 為其書名，顯然亦有同樣的意圖與野心；而且戴沙迪所定義的 *Mediasphere* 範圍極廣，從報章雜誌到影音圖像，均在其列。然而在書中，作者始終固守在小說這一塊，對其他媒體僅僅點到為止。譬如在電影方面，遲至1998年才論及侯孝賢的《海上花》，彷彿在此之前，電影一直處於缺席狀態。此外，對於報紙充斥的廣告圖像乃至各式畫報，亦少有論及。其實，除小說之外，同時代更有大批報章雜誌的方塊文章，以隨筆或雜文的形式，講述上海的現狀與掌故，透過文人筆端，也點點滴滴參與了「上海城市形象」的勾勒，這些「滬上閒話」所呈現的文字意象，常是被忽視的一塊，其影響力未必遜於海上小說。<sup>3</sup> 戴沙迪當然不必處理所有文化生產的媒介，但既然以 *Mediasphere* 為名詮釋上海，卻僅限於小說，未免給讀者意猶未盡之感。

---

2 以西方學者為例，先驅者便包括：白吉爾 (Marie-Claire Bergere) 討論上海與中國資產階級興起關係，韓起瀾 (Emily Honig) 觀察城市中的紗廠女工，顧德曼 (Bryna Goodman) 分析同鄉組織，魏斐德 (Frederic Wakeman, Jr.) 檢視國家對城市秩序的控制等。有關1980年代以來與上海史相關英文與日文著作的介紹與分析，詳見熊月之，《上海通史》，第1卷《導論》(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)，頁199-230；熊月之、周武主編，《海外上海學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)，頁87-324。

3 有關「滬上閒話」的重要性，係審查人提示，謹在此致謝。

整體而言，這本書清楚指出海上小說與上海城市形象間錯綜複雜的關係，兩者之間可以是寫實的（如晚清小說描繪的租界景觀），可以是意象的（如新感覺派小說經常描寫的光、熱、力），也可以是懷舊的（如歷代文化人試圖重新發掘與詮釋過去），觀察角度頗具新意。它與李歐梵的《上海摩登》相互輝映，提醒我們上海璀璨的過往是奠基在文字、圖像等各式媒體的塑造之上，要充分瞭解上海的現實，除檔案文書、報紙新聞外，這些媒體也是不可忽視的文本。